

关于夏衍的《赛金花》和有关问题的讨论

(資料汇编之二)

《 内部資料 》
妥 为 保 存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編印

1966年4月

毛主席語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
意识形态方面的誰胜誰負問題，
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
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
放棄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
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 录

評《賽金花》劇本的反動思想.....	穆 欣.....	1
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資產階級思想.....	何其芳.....	2 9
談《上海屋簷下》的創作.....	夏 衍.....	5 5
題材、主題.....	夏 衍.....	6 1
賽金花（劇本）.....	夏 衍.....	1 — 5 6

評《賽金花》劇本的反動思想

——剖析三十年代的一個所謂“名劇”

穆 欣

一、對《賽金花》歷來就存在着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最近幾年有些人在大力鼓吹三十年代戲劇和電影成就的時候，把它捧為“國防戲劇”的代表作，這就挑起了新的爭論。

最近幾年，很有一些人非常熱心吹捧三十年代的電影和戲劇。夏衍同志當時寫的劇本《賽金花》，就被他們當作三十年代“國防戲劇”的代表作品來大吹大擂。一九六三年，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寫道：“夏衍的國防劇作《賽金花》，在電影和戲劇工作者通力合作之下，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由四十年代劇社作了首次演出，……在文藝界和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一卷，第四一七頁）

《賽金花》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竟引起有些人如此熱心贊揚，並且居然把它載入新編的“史冊”呢？

這個劇本主要取材於劉半農、商鴻逵纂寫的《賽金花本事》，以及當時一般無聊文人、騷客吹捧賽金花的一些記載（並且受到曾朴小說《孽海花》的一定影響）。全劇以清末妓女賽金花的事跡為主線，以一九〇〇年義和團抗击八國聯軍入侵的庚子事件為背景。它的主要情節是：劇本一開始，描寫賽金花帶着她的“金花班”到了北京，如何巴結上戶部尚書立山，結識侍郎盧玉芳等一伙權貴。敵人雖已兵臨城下，這班人照樣尋歡作樂。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劇本惡意地描繪了義和團的“暴行”，稱他們為“拳匪”；而德國侵略軍卻槍殺了正在街頭“行劫”的義和團，“搭救”了逃難的民婦。這時賽金花遇到沿街搜查的德軍，她仗着會講幾句德國話和曾“握過弗特爾皇后的手”，保全了自己，還救出官員程璧等人。此後賽金花即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劇本寫作瓦德齊）姘居，

还尽力为敌人筹办军粮。义和团的抵抗失败，清廷派李鴻章与敌议和。由于敌人条件过苛，谈判陷入僵局。李鴻章派程璧来见赛金花，用西施与昭君的故事，劝她帮忙“交涉”。她“说服”了瓦德西，又使克林德太太放弃了原来坚要慈禧太后认罪的条件。剧本衷心地赞扬了她的“外交手腕”，把她描绘成了一个中国人民的“救世主”。过了五年，赛金花因为虐斃班子里的妓女凤玲，吃了官司，被判押解原籍。剧本通过这个结局，表达了赛金花的愤懑心情，“暴露”了清廷对她的“忘恩负义”，作者带着打抱不平的心情写出全剧的最后一场：《可是，他们给她的报酬呢？》

对于这个剧本，历来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种意见认为，剧本对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极力诬蔑，而对外国侵略者的奴才走狗则竭力颂扬，表现了敌我不分的思想，宣传了投降主义的哲学，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

一九三六年八月，这个剧本发表不久，鲁迅就在题作《“这也是生活”……》的文章中愤慨地讽刺说：“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稍后，艾思奇同志也在一篇文章中说，赛金花是“一个事实上的汉奸”，根本不值得同情。他说：“不要靠赛金花这样的人来替我们保持部分地方的安全，不要让各地守土的将士孤军独战，要决定全国规模的抗敌政策，然后中国的自由解放才会有希望。”（《赛金花的风波》，《实践与理论》第二五三——二五四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还有人写了一篇题为《赛金花和黄郛》的评论，把她和大

汉奸黄郛相提並論。評論中写道：“国难严重到这样地步，有许多人竟想到潦倒旧京的賽金花，忙着写傳說，編剧本，甚而至于有人称为有国防意識。这是一种毒素。我們决不能再想有一个女子，在国土备受敌騎蹂躪的时候，乞来敌将的爱怜，以減輕（？）一些些人民痛苦；我們不能再想象这种可恥的事情。”評論在結尾处大声疾呼道：“我們現在必須以热血来保全領土！我們不需要賽金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上海《立报》）

这年十一月間，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金城戏院首次公演这个戏的时候，尽管有“好几位有名的戏剧家和影星通力合作”，可是“一般的批評，好象都不大滿意。”（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立报》）另外有些报道也說：“这次演出的成績”，“是相当使我們失望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这个剧本的演出，曾經引起广大观众的憤慨！

另外一种意見，則对这个剧本給予高度的贊揚。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賽金花》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四月十六日，上海剧作者协会专为这个剧本召开了座談会，會議的主持者在“結論”里面說：“我們毫不否認的，这剧作是在中国提出建立‘国防戏剧’的口号后，第一次收获到的偉大的剧作。”（《文学界》月刊創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出版）同时，有人称赞它是一九三六年“最光輝剧作”，說什么“《賽金花》的公演固然是今年戏剧界的一件大事，即是《賽金花》这剧本在今年产生也是一件大事。”（《一九三六年的戏剧——活时代的活記錄》，《光明》第二卷第二号）有个对它捧場的人写道：“在夏衍先生的剧本里，把賽金花写成了一个有灵魂的人，在家国飄搖之秋，軍慌馬乱之际，一个妓女身上还閃动着爱国热情，尤其同那些鼠窃狗盜者比較起来，更显得她的人格神圣偉大！記得几年以前，張竞生先生在

《时事新报》上，把賽金花比諸法国牧羊女子貞德，貞德自說神附其身，帶領民众抵抗英国，和賽金花的向瓦德西‘說情’，虽不是同一的姿态，但其爱国热情又复何異？”（《安息了的賽金花女士》，杜君謀編：《賽金花遺事》，第五〇頁）

全国解放以后，还有不少評論家为它捧場，如象王瑤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刘綏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等，都对这个剧本採取肯定的态度，作了高度的評價。王瑤在《国防戏剧》的题目下面写道：“当时大家认为以国防为主题的最成功的剧作是夏衍（沈端先）的历史剧《賽金花》”；“他暴露当时政府腐敗昏庸的投降外交和官僚奴才們的无耻，都是很成功的”。“作者把他的憤怒化为諷刺，作品就因之有了力量。”这种喝采叫好的声音，一直繼續到一九六三年《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出版。

对于同一部作品，評價竟有如此的差異，不能不引起人們对于它的注意。《賽金花》这样的作品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个剧本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需要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对剧本的思想內容进行分析，得出一个正确的評價。

三 《賽金花》对义和团运动的攻击和誣蔑，也是对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傳統的誣蔑。

《賽金花》剧本是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这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非常尖銳的时代。在这场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斗争中，剧本是歌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的英雄，还是贊揚屈膝投降的民族叛徒？就是評價它的主要标准之一。

义和团运动是十九世紀初叶一次規模巨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在八

国联軍侵略中国的时候所进行的英勇抵抗，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阻止了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阴谋。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凡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象他们对待任何群众的革命运动一样，无不带着满腔热情歌颂义和团反抗侵略的革命精神。一九〇〇年，列宁写的《中国的战争》这篇著名的文章，曾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而以难以抑制的愤怒斥责八国联軍特别是沙俄侵略者对中国的无耻掠夺！

一九三九年，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指出，它和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历次的革命运动，“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二六頁）

誠然，同封建时代的其他农民运动一样，义和团有其落后的一面，其中一部分领导成员对清朝某些统治者曾经抱有幻想，因而不可能把当时轰轰烈烈的人民反帝斗争引向胜利。但是，我们在评价整个义和团运动时，首先并且主要地应当看，它究竟是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只要从这个观点出发，任何不带资产阶级偏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义和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人民运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洪流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可是剧本的作者是怎样看待这一运动的呢？他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了，斗争的锋芒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反动的统治阶级，而是把矛头指向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剧本对义和团虽然着墨不多，却进行了极其恶毒的诬蔑和丑化。剧本作者承袭了反动的历史观点，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硬说义和团是“替几个清室贵族争夺领导权的工具”；说它由于“在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反抗，在国外招致了八国联軍的攻击，而终于遭

遇了慘痛的失敗。”（《歷史與諷喻》，《文學界》創刊號，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出版）他還通過劇中人的對話寫道：“目前朝政快有個非常大變，咱們皇上恐怕不免要做唐中宗了。”“就為了義和拳的事情，老佛爺跟皇上又記了很大的衝突……。”唐中宗李顯是武則天的兒子，繼唐高宗李治為帝，後為武則天所廢。劇本中的這些對話，顯然是寄同情予光緒皇帝的。

作者就從這種反動的历史觀點出發，對於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作出錯誤的分析，認為其主要矛盾是：以光緒皇帝所代表的維新派、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為矛盾衝突的一方，而以腐朽的慈禧太后所代表的保守勢力與義和團為衝突的另一方。這樣就造成了是非的混淆，歷史的顛倒，敵我界限不分。劇本美化了帝國主義，歌頌了賣身投靠敵人的賽金花，惡毒地攻擊和丑化了義和團反帝運動，而且把宅和昏庸腐朽的清廷等同起來，甚至把那些在反帝鬥爭中流血犧牲的英勇人民誣蔑為趁火打劫的盜賊！

如果不信，有劇本為證。請看劇本第三場是怎樣描繪義和團的：

難民，過場，兩個義和拳抓着一個中年婦女登場，拳民向四下

張望一下，很快地除掉頭上包着的黃巾，指着婦人喊。

拳一 二毛子！還抵賴！

拳二 快，把錢拿出來！

婦 我不吃教，我是……

拳二 沒工夫跟你斗口，快，把衣服脫下來，咱們得走啦！

婦 （望着他）什麼，不跟毛子打仗，闖了禍，你們倒要走？

拳一 （用刀威脅着）還跟你爺斗口！都是你們這批二毛子，

吃洋教，私通外國，幫助洋人欺負咱們中國人！

拳二 （用手去撕婦人衣服）你不要命……

脚步声，洋兵呼喊声。

拳一（对拳二）反正咱们没路走啦，咱也得杀个二毛子出一口气！咱好好的一家人，全是你们这些吃教的二毛子勾结衙门，靠洋人势力，将咱一家杀得一个不剩……（语塞，讲不下去，举刀）

妇（挣扎，反抗地）狗东西！你们嘴里讲杀洋人，可是洋人一个也不会动，只杀中国人，只杀中国人的女人和小孩……

拳民一刀砍下，妇人用手挡，手上流血，两个洋兵上，一枪将两个拳匪打死，妇人很快地伏在暗处，洋兵走近，搜索拳匪尸体，一个拾起一块画八卦的黄布。

兵三一个绝妙的战利品！

兵四（从另一拳匪身上搜出一串鐲子戒指，举得高高的）哈哈我这个战利品更实用得多！

（二人大笑，过场）

在这里，剧本作者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对于义和团反帝运动的革命意义及运动结局失败的原因的认识，对于义和团形象的描写，都是十分错误的。

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二五——六二六页）

因此，当时坚决反对义和团群众运动的绝不是什么“国内”的“民

众”。而是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反动统治集团。义和团运动本身就是一次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成千成万的劳动人民不但热烈拥护这个运动，并且如火如荼地投入这场斗争。就连清人刘孟扬站在敌视义和团立场上写的一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也无法掩盖当时人民群众热烈支持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事实。这本书里写道，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义和团在天津陈家沟地区阻击“洋兵”获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各处人民”前来向“拳匪送得胜饼与绿豆汤者，络绎于道。”“由是各舖户居民，皆用红纸书‘义和神拳，大得全胜’八字，贴门旁。”（《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二册，上海神州国光社版第一六页）夏衍同志却说什么义和团“在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反抗”，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关于外国侵略者残杀义和团的情形，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供称：“余曾命令各军，每逢我军所到之处，均应尽力搜捕拳民，捕到之后，立即枪斃。”（王光祈译，中华书局一九三〇年出版，第四五页）他还讲到清廷勾结外国侵略者对于义和团的镇压：“当联军（向保定）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斃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第四九页）

剧本作者把八国联军的侵略说成是义和团“招致”的，更是荒谬到极点。这种谬论导致的结论将是：对于侵略者应该屈膝投降而不应该反抗。这种反动的历史观点对我们并不陌生。周谷城的许多历史著作里面，就充满了这种颠倒黑白的谬论。他在《中国通史》中分析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原因时，认为“八国联军之大压迫”，“是华北农民的大反抗所引出的”。（开明书店版，下册，第一〇五〇页及一〇五一页）这种谬论来自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是十分清楚的。

义和团运动是伟大的爱国农民运动，它和所有的农民战争一样，是那一个时代的历史的火车头，是冲击封建统治、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

力，是在腐朽的封建統治下打破現狀與展開新局面的先進力量。對於這樣一場尖銳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作者的褒貶愛憎，總的出發點應以各個階級（人物）對國家、對當時的人民革命鬥爭所採取的基本態度為依據。這本來是一個革命作家應該具有的最基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夏衍同志不但完全背離了這個最基本的觀點，甚至还完全不顧正視歷史事實這個最起碼的要求。那麼，他把《賽金花》寫成一個反人民反愛國主義的劇本，又有什麼奇怪呢？但是，階級的壁壘、歷史的是非是絕不容許混淆的！《賽金花》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攻擊和誣蔑，也是對於中國人民大眾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傳統的誣蔑。

三 在對外國侵略者和封建統治者的描繪上，作者不僅喪失了一個無產階級戰士應有的階級立場，也喪失了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有的民族立場。

劇本反人民反愛國主義的錯誤，很突出地表現在它對侵略者——八國聯軍的描繪上。

庚子事變期間，八國聯軍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在京津地區至今不難找到他們當年留下的罪跡）。這些外國侵略者殘害中國人民的無恥行徑，在當時流傳下來的許多史籍中都有所記載，就連《瓦德西拳亂筆記》也供認不諱：“聯軍占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亦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第五一——五五頁）劇本《賽金花》不但沒有揭露八國聯軍的屠殺罪行，沒有把侵略者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猙獰面目如實地表現出來，反而替他們粉飾，掩蓋了他們丑惡的嘴臉。

例如，剧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帶領軍隊侵入中國的聯軍統帥瓦德西，是德帝國主義者培養的殖民老手，他的狡黠、暴戾，在他現身說法的《瓦德西拳亂筆記》里面，會有不少的供述。這些赤裸裸的供述再次証明了，世界上一切反動派，一切人民的敵人，在對待革命人民這一點上都是極其殘暴的，他們的反動本性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可是，劇本對於瓦德西的凶狠面目很少揭露，反而不惜筆墨去描繪這個劊子手的文質彬彬的外貌，甚至把他寫成了很守信義的人物。瓦德西部下的那些德國兵，作者也曾在某些場面有意無意地把他們描繪成懂禮貌、守紀律的“文明人”！

這種喪失立場的描寫，在劇本的字里行間隨處可以看到。《這手握過飛燕皇后的手的》一類的標題和台詞，把賽金花過去隨洪鈞出使歐洲曾與德國皇室有過交往的例行公事，當作了了不起的風流韻事來大書特書，乃是半殖民地社會統治階級中間流行的崇外、媚外心理的反映。從這個劇本的主題來看，《賽金花》和那時候的其他宣揚賽金花移行的著作一樣，都是從庸俗和低級趣味着眼的。他們所以如此狂熱地吹捧賽金花，對於她的歷史這般津津樂道，僅僅是因為她和瓦德西睡過覺，在中國睡過，在外国也睡過。這不但是無聊，而且下流，是很卑劣的心理。

這種仰帝國主義鼻息的崇洋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並不是個別的偶然現象。有一小撮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人，特別是某些身居十里洋場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身上，總是散發着這種崇洋媚外的臭味。他們極力掩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罪惡，大肆誣蔑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正義行動。他們極力宣揚西方的“文明”，百般嘲弄中國人民的貧困、愚昧和落后。這種洋奴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買辦階級文人胡適。胡適從來就認為中國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而是本身的“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他對人民大眾的反帝愛國運動，

总是极力攻击，恣意誣蔑。他曾无耻地说：“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騙自己的話！”“現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須‘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輕輕抹煞！”（《請大家来照照鏡子》《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四七——四八頁）为帝国主义的利益尽忠效劳，胡适确实是不遺余力。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是一种最沒有骨气、最沒有出息的奴才思想，它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精神相对立，是为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所不齿的。

剧本对于腐朽的清朝官吏在某些地方也有所揭露，如通过賽金花和瓦德西关系的描写，从側面揭示了清朝統治者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棄之不顧，而对于皇室的面子却不能不設法保存。另外，有少数台詞，如清朝官員見到德国軍官时說的“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几句话，也不是沒有一点“諷喻”的意味的。但是，作者的主要意图不在这里。剧本里面穿插这些情节，只是为了能够更深刻地衬托、美化賽金花，更明显地表現作品的主题：“那些大官大府，比一个卑微下賤的女人还不如。”因此，这一点点可怜的“諷喻”，就根本談不到什么积极的意义。何况这些“諷喻”絲毫也沒有从政治上触动清朝統治集团勾結外国、鎮压人民的反动本质。以李鴻章和瓦德西議和談判为主要內容的第五場为例：它沒有真正去揭露清朝統治集团卖国外交的奴性和封建官場的丑恶，而是以李鴻章在上海时也曾同賽金花有过“交情”，以及賽金花此时故意搶夺他的人参、燕窩，跟他开玩笑一类无聊的“风流韵事”，掩盖了問題的本质。結果只能让观众在嘻笑中忘却了国家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它跟专以獵取奇聞秘記来炫惑讀者的小說《孽海花》一样，通过这种偷天換日的手法，把一場严肃的政治斗争，幻化为茶余酒后的海外奇談。——当时上海公演《賽金花》的广告正是这样写的：“万人望眼

欲穿的七幕历史悲壮哀艳名剧。提醒你三十七年前的一段伤心恨史，包括着赛金花本人的一生奇遇艳迹。”还说什么：“凭三寸不烂之舌，救北京城内千万无辜生灵！施灵巧敏捷手腕，令外国英雄拜倒石榴裙下！”这个广告文字虽不一定要由作者负责，但也不能不认为是对剧本内容的一种反映。在这个剧本里，作者似乎染上了不可救药的民族自卑的变态心理，把杀人、放火、妓院、抽鸦片、磕响头、变把戏，迷信的八卦图、秀才背书的丑态以至妇女的小脚……一切可以用来证明中国人“愚昧、落后、野蛮、丑恶”的东西，一切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具有侮辱性的东西统统搬到舞台上前来展览，跟帝国主义者的“西方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剧本第四场的开头，作者通过侵略者审问一批俘虏的场面出尽了中国人的洋相——这里出现的中国人，全是一些奴颜婢膝的角色，根本没有一个表现出一丝一毫反抗性的人物。然后，又让瓦德西和负责这场审讯的德国军官杭司·汉纳根，对中国人民作出具有极大侮辱性的“评价”：

瓦（望着左右两边的被俘者，问汉）您研究的结果怎样？

汉（恭敬地）很满意，本职在非洲的时候，也曾照样的一个的一个的试验过，黑种人比中国人凶猛，可是中国人比黑种人聪明，虽则狡猾一点，可真不愧是礼社之帮，有礼貌，见了上头的人抬不起头。

瓦（喝了一口酒）那很好！聪明，能吃苦，肯服从，这是殖民地人种的三个最好的条件！

真叫“无巧不成书”，就在《赛金花》演出过后不久，一九三七年五月，柏林试映的德国托比斯公司辱华影片《北京的恐怖》，也是以

“庚子事件”为背景的。“它的前奏曲是吵得令人发昏的大鑼声，幕前的說明詞是用極煽動的辭句写出：‘一九〇〇年华北大恐怖，中国的排外暴动，使外人生命財產备受危害……’。”这部影片的情节是：“一个长袍大褂、蓄八字胡的拳匪头目杜杭像运軍火到北京去，那时北京城中拳匪作乱，杀外人，焚教堂，后来幸亏一位‘英勇’的德国白軍官乐克中尉率兵蕩平，这个‘北京的恐怖’才归平息，里面飾中国人的演員，不象我們常見的同胞，而是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蠢貨；有杀人如麻的拳匪，有和駱駝混在一起的褻褻汉，还有淫蕩的下流的娼妓，它把單調的鑼声当作中国的音乐，更把中国人描画得极其野蛮、愚笨、可怜。……”（《恶毒的侮辱》，《立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

把这一部德国法西斯摄制的辱华影片和夏衍同志的剧本《赛金花》作比較，許多場景竟是何等的相似！特别是《赛金花》加給义和团的“拳匪”称呼，不仅承襲了清官“上諭”的蔑詞，也跟辱华影片里的对白完全一样。因此，尽管《赛金花》以“国防戏剧”相标榜，作者还郑重地声明过：“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內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按：指当时的北京）里面活跃着的人們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諷喻性质的剧本。”“想对于那些愿为奴隶和順民的人們加以諷刺和咀咒”，“是以反汉奸为中心的奴隶文学的一种”。（《历史与諷喻》）可是，既然作者只是通过上述的手法暴露我們民族的“落后”和“野蛮”，除了侮辱我們偉大的民族和劳动人民，怎么还扯得上从政治上“諷喻”国民党？既然剧本把真正反帝爱国的义和团打下了十八层地獄，而将一个卖身投靠敌人的汉奸妓女捧到九天之上，哪里还談得上揭露国民党政府投降妥协的卖国政策？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漲的时候演出的这个戏，絕不能鼓舞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不能激发对清庭腐朽統治的

憎恨，更无法对国民党反动派“完成諷喻的作用”，而只会毒害观众的心灵，瓦解人民的斗志，轉移人們对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的慘痛的生活正視。而且因为实际上它是在替投降变节行为辯护，其客观效果也只能是鼓励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向敌人投降妥协！在这里，作者不仅丧失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应有的阶级立場，也丧失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有的民族立場。因此，它的出現曾經激起許多正直爱国观众的憤怒，絕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

四 剧本吹捧汉奸妓女賽金花，不仅格調卑下，而且也暴露了作者对历史上落后、消极、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积极、革命的东西，採取了顛倒黑白的态度。

这个剧本的反动思想，更加集中地表现在賽金花这个人物形象的創造上。这个剧本一如它的名字，是以賽金花为主角的。作者帶着无限同情和欣尝的态度，精心塑造了这个人物。

剧本大力吹捧的賽金花，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妓女。她后来作了洪鈞的姨太太，曾以“状元夫人”的身分跟随这位欽差出使欧洲几个国家。后来洪鈞死了，她又在上海、北京等地重作妓女，而且兼有老鴇子身分。八国联軍侵略北京期間，又曾卖身給联軍統帥瓦德西。这个当年名噪南北官場的“名妓”，一时又成为外国主子寵幸的紅人。这种“不寻常”的经历，引起一班无耻文人如蝇逐臭的兴趣，替她作了許多无聊的宣揚。

作为历史人物来评价，賽金花本人根本不值一提。她在这一場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庚子事变中，是侵略者心目中的“漂亮的軍需官”，全力給敌人“办給养”、找女人，扮演着出賣祖国的汉奸角色，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民族敗类。不論她的晚年如何淒涼，都是不值得同情的。

賽金花的“名气”，是由一批封建余孽与买办文人吹捧起来的。試把賽金花的鼓吹者开列一个名单，其中最起劲的要算著述小說《孽海花》